

2021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肆虐，全球仍难摆脱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愈演愈烈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使全球化遭遇挫折，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开放与封闭、包容与排外、合作与对抗的激烈交锋。1月25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要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坚持协商合作，坚持与时俱进。这一重要讲话重申了中国对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承诺，提振了国际社会对坚持多边主义的信心，也为应对当前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开放包容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基础

当前，全球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经济持续低迷不振，技术封锁、贸易保护、经济脱钩等逆全球化言行在某些国家不断抬头。实践雄辩地证明，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发展是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在全球化时代，人为割裂经济联系，搞封闭孤立、赢者通吃是一条注定走不通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各国只有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才能引导世界经济早日走出低谷，恢复活力。

经济上的开放要依托思想上的包容。只有推动不同民族、种族、宗教、政体之间不断增进包容，开阔视野，才能使各国在相互学习中增强自



更大力度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 曲鹏飞

身发展水平，为各国间互鉴互信贡献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全球化时代，傲慢和偏见是人类交往过程中最大的无知与障碍。人类的思想与文明因包容互鉴才有前进的动力。只有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学互鉴的包容精神，才能避免“文明冲突”和冷战思维，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的和谐。

遵规守制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保障

一个有序的世界离不开对法治的追求与建设。国际社会由于全球化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国际法基于良法和善治的目的，在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不同的层面对国家的行为进行着规范与完善。二战以来，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国际事务中被普遍地崇尚与遵行，其基本原则为：一是遵守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国际法基本准则。二是信守国际承诺。多边协议一旦达成就对所有参与制度的行为体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各国均有责任与义务维护协议的严肃性和法治的尊严。

践行多边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信守共同商定的国际协议。杜绝将毁约和“退群”作为谈判的工具筹码，杜绝通过使用霸权手段而非协商手段达成国际规则。大国更是要坚持原则，遵规守约，带头维护国际法治的尊严和效力。

协商合作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原则

多边主义因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而生，因此，国际规则的制定应由各国共同完成，全球治理应由各国共同参与，发展成果应由各国共同分享，这就决定了各国之间的协商合作是实现多边主义的根本原则。协商合作首先意味着平等，即国家不分大小贫弱都应尊重他国合理的利益与安全关切，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权利，也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是公平。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治理议题上，各国都共同负有责任，但要正视历史责任的存在，尊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差异，重视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责任的划定上要秉持公平

原则，根据各自能力、考虑各国国情。再次是协商。即对于分歧摩擦，坐下来平等坦诚沟通，以对话代替对抗。

协商合作是新中国外交最鲜明的风格之一。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与周边国家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平等协商、灵活务实的典范。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与冷战思维，毛泽东指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21世纪之初，中国即提倡全面贯彻多边主义的合作发展精神，各国之间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平共处，协商合作”。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以协商取代胁迫，以多赢共赢取代赢者通吃，相互照顾彼此关切，这是中国倡导与践行的多边主义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追求。

创新发展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动力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前

所未有，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层出不穷，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问题突出。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大变革的时代。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

多边主义的创新发展首先要依托全球治理方式的创新。当前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人类全球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大考，暴露了现行多边机制对全球性重大危机准备不足，缺乏合作和团结互助。国际社会亟须以创新方式思考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2020年，面对疫情大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中欧班列横贯亚欧大陆，通向欧洲20余个国家、90多个城市，用全年开行中欧班列12400列和发送集装箱113.5万标箱的骄人成绩，有力支援了沿线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为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其次要依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疫情之下，各国普遍面临经济长期下行压力，搞封闭脱钩犹如饮鸩止渴，各国只有维护公平贸易规则，支持

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贸易体制，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才是纾困全球经济的最佳药方。面对“逆全球化”潮流，中国加速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7个经济特区和21个自贸区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新雁阵。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推进国际经济合作达到新高度。再次要依托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科技创新通过多边合作实现共享、流动和重新组合，打造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打造发展理念相通、要素流动畅通、科技设施联通、创新链条融通、人员交流畅通的创新共同体，促进各国创新协同发展及合作应对挑战，使各国人民在多边合作中共享全球化科技成果。



（上接1版头条）在精准方略指引下，我们通过建档立卡精准识别，搞清楚了贫困人口分布在哪些村、是哪几户哪些人、致贫原因是什么，根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采取帮扶措施。2019年又集中开展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对全省62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逐户逐项上门排查登记，进一步摸清底数、找到根脉，使帮扶措施更加精准、脱贫质量更有保障。扶贫指导思想的转变，从根本上扭转攻坚克难、开创脱贫新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扶贫开发新路子。

集中资源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在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阶段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指出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发出了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总攻号令。凉山彝区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党中央对凉山脱贫采取了特殊帮扶措施，安排10个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安排广东省、浙江省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据了解，2016年以来，广东、浙江两省17个市61个县与我省12个市（州）68个贫困县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00多亿元，实施项目2600多个，惠及110多万人。省里专门为凉山州出台了34条支持政策和16条工作措施，从全省各地选派5700多人组成综合帮扶工作队常驻凉山各贫困县、贫困村，不脱岗不收兵。正是有了全国上下一心协力的帮扶支持，短短几年时间凉山彝区就发生了沧桑巨变。

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内生动力。长期以来，由于地理封闭、交通不便，凉山彝区不少干部群众思想守旧，“穷怕了不敢干、穷惯了等靠要”。这些年我们持续推进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注重增强贫困群众致富本领，激发他们的信心斗志。黑日小文、黑日次沙是布拖县火烈乡的两个彝族青年，先是自己出去打工，之后开办了人力资源公司，专门介绍彝族群众到广东务工，带领众多彝族青年走出大山、走向新天地。金阳县马依足乡900多名彝族绣娘，“背着娃、绣着花、养着家”，纯手工生产的围巾、袜子畅销全国各地。彝族群众正从被动产式的“背我走”向主动式的“我要干”转变，用勤劳双手创造新的生活。

真抓实干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真抓实干，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针对适龄儿童少年辍学问题，组织干部逐户排查，建立台账，每个孩子都由专人跟进，复学一个

销号一个，直至全部解决。对扶贫领域“微腐败”问题决不姑息。2018年，雷波县发现个别干部利用发放补助卡之机截留贪占贫困群众的“救命钱”，遂依纪依法进行了严肃查处。我们举一反三，在全省组织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整治，退还群众被侵占资金数千万元，处分一批吸贫困难群众中的“蛀虫”，有力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一大批帮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奋战脱贫一线，有的带着爱人一起参加扶贫，凉山州就有52对“夫妻档”，还有一些同志因过度劳累或遭遇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用无怨无悔的奉献和担当，在脱贫攻坚一线践行初心使命，交出了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出色答卷。

需要重视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使古老大凉山焕发了新的生机，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仍任重道远，一些新情况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大批贫困群众集中安置对改善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大凉山沟壑纵横、山高坡陡，部分贫困群众散居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高寒山区，搬出来是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通过近几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目前凉山州超过800人以上的安置点有24个、3000人以上的有10个，有的规模超过1万人。这一方面使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适应新环境还需一个过程。一部分群众生产在农村、生活在社区，在社会治理方面属于“夹心层”，不能简单按城市或者农村人口来管理。调研发现，集中安置点规模越大、吸纳群众越多，就越容易造成人地分离、人畜分离问题，有的群众“回老家”种承包地、养牲口甚至需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同时，群众进了小区，吃饭、饮水、买菜、买衣服都要花钱，还要交物业费，生活成本明显增加。搬出来不是目的，还要稳得住、有收入、逐步能致富。短期内，要注重解决好群众返回原居住地进行农耕生产的交通组织问题，在原地适当保留部分生产用房供统一使用，方便群众轮值养畜放牧或存放生产资料。长远看，需要大力发展产业、扩大就业，让搬迁群众改变原有生产方式、拓展收入来源，融入城镇社区生活。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需要把农村发展均衡性和政策普惠性提上日程。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政策的“悬崖效应”，在深度贫困地区尤为突出。

经过脱贫攻坚，一些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村、非贫困户的差距大幅缩小，有的甚至发生了倒置。还有一些偏僻的贫困村，本来人口就不多，贫困户享受政策搬出去了，剩下一些贫困户孤零零地留在山上。据统计，凉山州搬迁安置后仅剩30户以下的村子有171个，其中无人居住的有51个，处分一批吸贫困难群众中的“蛀虫”再配套通路、通水、通电，是一笔很大的投入，管护成本也难以负担。相比之下，还不如给一些政策把这部分贫困户整村搬迁，以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对迁出后的村址进行生态修复或土地整理。我们正在全省范围进行摸底，统筹各类政策，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把能搬出来的尽量都搬出来。脱贫攻坚结束后，需要更加注重政策的普惠性，适当扩大政策惠及范围，尤其对一些边缘户、相对困难村加大扶持力度，整体提升农村发展水平。

顺势而为推动村级集体经济规范管理、发展壮大。脱贫攻坚形成了大量新的资产，包括国家支持建设的乡村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各方面帮扶的产业设施，村级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为培育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管护好这些集体资产，使其实现保值增值，并让全体村民共享集体经济的收益，是急需研究解决的重点问题。法律明确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在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第一顺位是本级集体经济组织。由于村党支部是政治组织，村委会是自治组织，专业合作社大多是部分村民按专业或股权组建的合作经济组织，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完整功能，依法规范设立全体村民参与共有的集体经济组织十分必要。对土地、森林、草场等法定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以及在农业农村发展和脱贫攻坚中国家投入、各方面帮扶形成的新增资产，可以授权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所有者进行管理和运营。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起来以后，一方面要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监督和村民权益保障；另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探索村集体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运营机制，以低风险、可持续的方式放活经营权，通过承包、租赁、参股、联营、股份合作等方式增加集体收益，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这对于完善农村基层治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要着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农村干部人才队伍，从优秀的农民工、退役军人中选择培养村干部和后备力量，加强学习培训和岗位锻炼，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上接1版二条）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深刻汲取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居安思危、处变不惊的精神基因，深度激发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中忧患天下、与时俱进的优秀传统，尤其是更加自觉自信地立足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更高历史螺旋，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远见与坚定抉择，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实践必须自觉而深刻体认的本质要求与时代使命。

坚持以中国道路为立场和方法把握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表达了当代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上推动高质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趋向，也体现出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卓越的实践智慧。而其精髓和根本，就是要坚持以中国道路为立场和方法，自觉自主把握和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

所谓以中国道路为立场，就是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把握和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的根本目的，始终以及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确保道路不变、方向不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党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绝对领导，坚持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利益至上，坚持以人民的发展和国家安全为宗旨，坚持科学发展和共同安全，坚持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谓以中国道路为方法，就是要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智慧为根基和依据，注重面向时代特征和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新要求，既在发展上更多考虑安全要求，不因发展而不顾及风险挑战，也在安全上更多关注发展因素，不因安全而在发展上裹足不前，从而在推动发展的同时努力确保系统安全，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概言之，坚持以中国道路为立场和方法，就是要在现代化建设中把发展作为安全的保障、把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坚持辩证法、践行系统观，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坚持把发展作为安全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根基，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的物质基础。我国已进入现代化建设新发展阶段，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

矛盾和问题不仅已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而且也更加深刻地关联着国家安全利益，并可能更加直接地引发出现实安全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把握质量与安全的关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增强发展竞争力，坚持以发展质量的提升赢得发展主动权，从而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应对各种内外外部环境的安全挑战。

坚持把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的基本支撑。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和高水平开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尤其是面对大国关系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多变、民族分裂主义和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以及诸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压力，稍有不慎或应对失当，就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各种矛盾困境把握得更全面透彻一些，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从而以自身安全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持续稳定展开。

切实把安全发展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其现代化建设的实质，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讲，都必然要体现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并进。这表明，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展和安全从来都不是彼此作为外在相关性，而是相互作为内在规定性深刻决定着对方的内涵、性质与趋向。质言之，在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中，中国的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中国的发展也不是寻求生存而是在更高层次超越“卡脖子”困境的概念。这实际上就从总体上提出了“安全发展”这一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与基本逻辑问题。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展开来说，提出并强调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既从思维辩证法的高度提炼了统筹发展和安全之具有总体性的基本理念，又从实践辩证法的高度阐明了统筹发展和安全之具有针对性的

时代要求。总体上看，这就为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给予了明确理念引导与实践向导。

辩证把握新发展阶段，突出安全发展的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因此，坚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首先就是要立足把握新发展阶段的辩证特征，以安全发展的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安全发展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既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又引导我国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创新形成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道路、切实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和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历史性推进。坚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就是要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既从根本宗旨和问题导向上把握新发展理念，坚持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过程中落实安全发展原则，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厚筑安全发展的路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关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战略要求。坚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就是要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为关键，以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目标，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战略主线，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更加突出自主创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快数字化发展，从而以安全发展的新水平新成效塑造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新优势新辉煌。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